

揭秘中国顶级富豪圈子泰山会

2013年11月中旬,内地超级富豪俱乐部“泰山会”16名会员,在会长、全球电脑龙头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带领下,秘密来台,庆祝泰山会成立二十周年。报道称,泰山会成员,个个名列内地百大富豪,事业版图横跨高科技、地产、金融、娱乐各产业,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有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泰山会虽然名声在外,却鲜有报道。因为会员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何如此神秘,又有浩大的召唤力?

泰山会最初只是“四人小组”
泰山会成立于1993年,由于成立大会在山东召开,遂取名“泰山”。会员们也认为,“五岳至尊”的泰山寓意一种高度,以泰山取名,也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

元老。
当年,四位民营科技试水者,经常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没有老板椅,也没有高尔夫,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们互相提醒和学习。
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这样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

国家科委牵头的正规组织
1984年到1987年之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这个小组。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
陈庆振回忆,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者和媒体。社会各个方面都关注的时候,成立正规组织也是一种需要。于是,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怡芳。

人数缩减为16人

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成为需要。这个小圈子在1993年变成现实。中民协里影响力大、私交好的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小圈子——泰山产业研究会。这些会员企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每个企业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段永基等人对泰山会的构想是: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2005年的时候,泰山产业研究院改名为泰山会,人数缩减为现有的16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纯的企业家私人交流的圈子。“现在也主要是以娱乐性为主,会员们有时间就一起打打高尔夫,喝喝茶,聊聊天。”万通集团冯仑也说:“我们是一帮老男人,私人组织。”
拯救史玉柱
“泰山”一直沿袭着较为紧密的圈内关系。在私交基础上,泰山会总能爆发出市场之外的能量。其“救死扶伤”的功能,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史玉柱了。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清晰地记得:“当年史玉柱要在珠海盖楼,协会成员是不赞成的。此后,东窗事发,巨人集

团受到很大的打击。大家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他。”
长城企业战略发展研究所一位资深人士表示,“巨人集团倒塌之时,段永基帮了史玉柱一把,后来还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振雄风,并且获得新生。”2004年1月,四通控股更是花12亿元买下脑白金,并给了史玉柱20%多的四通控股的股权。
段永基和史玉柱是在1993年认识的,当年“泰山”刚刚成立,两人同为会员。

当然,帮扶是相互的。
譬如,史玉柱也为四通从IT电子改为做保健品的转型不遗余力,曾表示“出任四通CEO,年薪只收一元”。
泰山会成员
会长柳传志,理事长段永基,会员: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巨人集团史玉柱、百度李彦宏、段永平、中关村科海集团陈庆振、江西科端集团郑跃文、河南思达集团汪思远、横店集团徐文荣、和光集团吴力、华谊兄弟王中军。顾问:吴敬琏、胡德平。

《环球视野》第615期

秀兰·邓波儿的中国缘

1977年4月,秀兰·邓波儿到访中国。她的身份不是电影明星,而是美国外交官。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邓波儿系列电影在中央电视台的播放,此时,中国观众才在电视中认识了这个曾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
秀兰·邓波儿去世的消息传来,全世界的影迷给予深切的缅怀。在中国的各大头条网站及社交网络上,邓波儿的电影代表作也被“翻出来”。

让中国影迷尤为惊喜的是,1936年邓波儿在她主演的电影《偷渡者》中,饰演了一位曾在上海流浪的外国小孩芭芭拉。片中,邓波儿穿着中式斜对襟布褂,像模像样地拉着二胡,并说出了中文台词,其中一句便是“怎么回事,胡先生?”语调中带有明显的外国人口音,但可爱十足,令人忍俊不禁。

《华西都市报》2014.2.12



童年邓波儿学拉二胡

中纪委打虎路线图

2013年1月23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隔一年多之后,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观察过去一年多中纪委查办腐败官员的动向,中央高层在反腐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见,其中释放的新信号更是耐人寻味。而这,或许又昭示了未来数年中国式反腐可能采取的路径。
“老老虎”也被追责
贪功冒进、专断霸道的官员更易发生贪腐,成为新一轮反腐的鲜明特点。最为代表的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这3人在省内重点城市主政时,在官场都被公认为“有魄力”、“敢闯能干”官员的典型代表。尽管毁誉参半,但这类官员在过去多被视为“能干事”的人物,因而在仕途前景上也较同僚更为顺遂。殊不知,这种干部往往专断独行,贪腐起来胆子也大。
在2013年“打虎”行动中,先后有陈柏槐、郭永祥、倪发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这是新一轮反腐有别以往的另一特点。
63岁的陈柏槐被抓时,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这一“虚衔”;而59岁的倪发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仅保留副省级干部待遇。
检索中央反腐的公开记录可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非常之罕见。换言之,在过去,一名高级干部一旦实现了“裸退”,几乎就意味着“平安着陆”。

但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对“老老虎”追责“无例外”,使贪腐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陡增,当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慑力。
地方“窝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窝案”开始陆续被挖出。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通常“窝案”牵涉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关系异常复杂,一旦曝光,便会引发区域性官场地震甚至社会震荡。
地方上的标志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阳贿选案。这起发生在一年多前、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几乎使衡阳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全军覆没”。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
而“中石油系”窝案,则是发生在垄断国企内部的群体性腐败。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遭到中纪委调查。几乎与此同时,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统级高管也先后被调查、免职。不久,中石油前“掌门人”、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被立案调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窝案则与四川的前高官群体有关。中共十八大后,四川有3名省部级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后落马,且3人仕途上颇有交集。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已64岁,是目前被调查的“老虎”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后的直接上级领导——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在郭永祥升为秘书长后,李崇禧则升任省委副书记。再后来,李崇

禧从省委副书记退任(转省人大任职)后,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纪委查案颇有讲究。通常而言,在“瞄准”某高官之前,先在其外围布局,从其“身边人”或“朋友圈”入手调查。最典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女人;另一种是商人。
从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线,找到贪官们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并弄清贪腐财物之去处;从商人入手,则利于锁定官员贪腐的证据,并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关联的官员。
与之相对照的是,中纪委在查办案件上确立了“快查快结”的新思路。而在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还宣读了8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高官和14名列出具体姓名的“正在立案调查”高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3人并未结案(未移交司法机关),仍处于“立案调查”环节。此时,李春城落马已一年有余,郭永祥被调查也已超过半年时间,两人接受调查早已超过了6个月的常规调查时间仍未结案,这说明,此系列案件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涉及其他“老虎”。
有预计认为,接下来数月内,或还将有别的“老虎”被伏。除了中纪委正在立案调查的9名中管干部尚未公布具体姓名,仍可“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其他“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依据是,2013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10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第二轮巡视。目前,该轮巡视已进入收尾阶段。按照第一轮巡视“揪出”6个省部级高官的战果和节奏来看,这一轮巡视的成果同样也值得期待。

《南风窗》2014.2.12文/李克诚

邓小平三弟邓蜀平的坎坷人生

开明地主

邓蜀平共有兄弟4人,即大哥邓小平,二哥邓垦,四弟邓先清。邓蜀平是邓家房屋财产的继承人和家族势力的支撑者。在家乡,邓蜀平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给当地的热血青年写介绍信,推荐到延安找其兄长邓小平,使不少人得以投身革命。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但因他不逼租债,不放高利贷和不杀人越货,因此在肃反、反右、四清运动中,他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政府给他的结论是:地主出身,但是属于开明地主。

背井离乡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捎信叫来了阔别多年的三弟邓蜀平,邓小平对邓蜀平夫妇说:要把家产全部分给贫苦百姓,一样不留;鸦片烟必须马上戒掉;抓紧时间学习新的革命知识。不久邓蜀平夫妇进入西南革命大学,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1950年10月他们毕业时,邓蜀平夫妇被分配到荒凉偏僻的贵州省兴仁专署。而后前往普安县青山镇执行任务。邓蜀平出任共和国第一任青山镇长。

邓蜀平在青山担任镇长约15个月,后调到县财政科(局)担任科(局)长,直到1959年12月离开普安。

弟兄情结

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惦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

1955年底,邓蜀平在昆明的宾馆里见到自己的大哥。邓小平只是简单地问邓蜀平,工作怎么样。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丢下他们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单独和邓小平在一起,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但是每次吃饭,他们都感到很拘束,因为邓小平与在座的领导之间总要互相敬酒,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那种场合的气氛总是无法融洽。

后来,当人们问起见到邓小平的感觉和印象时,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他说和邓小平在一起一点儿都不自在。

客死六枝

1959年12月,组织上把他调到安顺市财政局担任局长。1961年5月,成立县级六枝市,邓蜀平奉命到六枝担任副市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蜀平被调往贵阳市南明区当副区长。然而,他还没有到新的岗位上任,邓小平已被当做党内第二大走资派揪出来了。得到消息,邓蜀平长叹一声,“完了”。接着他被革了职,天天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交待问题。无情的折磨使他身心憔悴,无端的屈辱使他大失所望。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的邓蜀平迫害致死。

《文史天地》文/陶昌武